

· 中西文化 ·

## 中國英語教學史上的曾紀澤

鄒振環

[提 要] 曾紀澤的英語學習開始於 1866 至 1867 年間,約在 1871 年底,才進入系統的英語學習。在學習過程中,他總結出一套掌握諧音批注英文字母,以幫助理解記憶的獨特方法。曾氏通曉英語口語和寫作能力,使他在外交活動中大顯身手,成為清政府派駐外國使節中最有才幹的一位。出使期間,他不斷書寫各種英文函和英華合璧詩,作為練習英語寫作的手段,並研讀了《語言自適集》等多種英文讀本。豐富的英語學習實踐,使他對英文文法產生了比較深入的認識,成為中國第一部國人編譯的英文文法書《英文舉隅》的推介者。晚明至晚清,徐光啟一代堪稱最早睜眼看世界的學者,很少有願意為直接瞭解西方而學習西語者。19 世紀 60 至 70 年代,在“天朝中心主義”仍然盛行的情勢下,作為清朝大臣的曾紀澤卻能全面系統地學習英語並取得突出成績,成為近代中國英語教育的引導者。

[關鍵詞] 曾紀澤 英語學習 《英文舉隅》 《中國先睡後醒論》

[中圖分類號] H31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074-14

曾紀澤(1839~1890),字劼剛,湖南湘鄉人,曾國藩之子,家襲勇毅侯。曾紀澤自幼受嚴格教育,通經史,工詩文,並精算術。性格剛毅,智力超常。1870 年,曾紀澤目睹了整個天津教案的處理過程,深深感到外語人才的缺乏。他尖銳地指出,自強的關鍵在於人才,除了忠孝氣節之士外,那就是需要既能瞭解外情,又通達外國語言文字,有見識的人才。研究曾紀澤一生的外交活動,不能不述及其外語學習。目前所見討論曾紀澤英語學習的文章,主要有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歐陽紅《曾紀澤的“中西合璧”詩》(北京:《中華讀書報》,2015 年 4 月 22 日)、燕宏博《一件晚清涉外社交信函》(上海:《書城》,2016 年第 11 號)以及段懷清《曾紀澤怎樣學英語——兼談他的“中西合體詩”》(上海:《文匯學人》,2018 年 12 月 7 日)等。《曾紀澤的外交》一書第二章討論曾紀澤洋務知識時述及其“西方語文的知識”;歐陽紅、燕宏博、段懷清三篇文章都有不少新材料和新見解,但均屬隨筆性質,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辯論。張仁杰《曾紀澤對晚清英語教育的創新與實踐》(沈陽:《蘭台世界》,2014 年第 1 期)一文認為,曾紀澤是我國第一個有史可載自學英語的人,豐富的英語知識使他能熟讀西方英文書籍,開拓了他的視野,奠定了其作為職業外交官的知識基礎,並一定程度化解了對西學的抵觸和懷疑,晚清高層內學英語之風開始盛行,許多

大臣爭學英語，連光緒皇帝也以學英語為榮，與曾紀澤有關。曾紀澤是否係中國第一個有史可載自學英語的人，尚有待進一步查證，因為之前林則徐也自學過英文，且光緒皇帝和朝臣們學習英語是否受曾紀澤影響，亦無實證資料的證明。本文擬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系統梳理曾紀澤英語學習的資料，從中國近代英語教學史的角度切入，予以進一步的分析。

## 一、曾紀澤學習英語的時間

曾紀澤學習英語始於何時？吳相湘在《譽滿中外的曾紀澤》一文中稱：“同治五六年間，紀澤在金陵督署時，就開始肆習英文——他於中國古韻六音的辨別和發音之餘，又特請一位西洋傳教士聖約瑟先生隨時教導，因此進步很快。”<sup>①</sup>隨時給曾氏教導的“西洋傳教士聖約瑟先生”是誰？吳相湘沒有注明，按照其說法，曾紀澤的英語學習應該是在“同治五六年間”，即 1866 至 1867 年間。李恩涵認為曾紀澤對學習西文西語發生濃厚興趣，與英國人馬格里（Samuel Halliday MaCartney，又稱馬清臣）有關。<sup>②</sup>馬格里在曾紀澤學習英文的過程中扮演了引路人和教師的重要角色。1865 年馬格里將蘇州洋砲局遷移江寧，擴建為金陵機器局，次年曾國藩視察，曾紀澤可能陪侍前往，兩人由此結識。馬格里經常將西洋學藝講解給他聽，並且利用外洋儀器比作實驗，以加深他的瞭解。同治十年（1871）曾紀澤日記中不斷記述，馬格里經常前往曾宅訪晤，為曾氏母親和兒女診病，曾紀澤也間或順道參觀金陵機器局的設備和工作情況，日記中不斷出現兩人“出談甚久”、“縱談極久”、“閒談極久”等記述。<sup>③</sup>在曾紀澤的藏書樓中，有馬格里簽名致送曾紀澤的英文物理學書籍，上面有很多紅藍綫條和旁注，可見曾紀澤曾認真地研讀過這些英文讀本。<sup>④</sup>此外，他與常勝將軍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也是好朋友，甚至已經可以通過洋涇浜英語來表達情意，並雕有“曾氏劄剛”（Garkhan of Tseng）的英文小印。但按照馬格里的說法，當時曾紀澤的英文程度，只是一知半解（a smattering of English）而已。<sup>⑤</sup>

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四日（1870 年 7 月 22 日），曾紀澤在給父親的信中說：“中外之語言文字特譯而明，而通事惟利是趨，但有左袒洋人，不聞有赤心為國者，此則中國無窮之憂，非特一時之患而已。故所謂自強者，不在於行伍之整齊，器甲之堅利，而在於得人。所謂得人者，當得忠孝氣節之士，而復能留意於外國語言文字風土人情者，是在平時蒐訪而樂育之，然後臨事能收其效耳。男近年每思，學問之道，因者難傳，而創者易名。將來欲拼棄一二年工夫，專學西語西文。學之既成，取其不傳之秘書，而悉譯其精華，察其各國之強弱情偽而離合之，此於詞章、經濟，似皆有益也。”<sup>⑥</sup>由此信函來看，1870 年 7 月之前曾紀澤應該已經學習過一段時期的英語，對英語學習的重要性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因此，吳相湘推測曾紀澤的英語學習開始於 1866 至 1867 年間，似乎是有依據的。

但據筆者所查，起自同治九年（1870）正月的《曾紀澤日記》，在一年餘的時間內，完全沒有曾紀澤學習英語的痕迹。第一次記錄學英語的時間，是同治十年九月廿四日（1871 年 11 月 6 日），上寫“二更後看外國字典良久”。自此，日記上間斷出現“誦英文”的字樣，廿八日後幾乎常常出現“看洋字”的記錄，說明曾紀澤約在 32 歲才開始了系統的英文學習。九月廿九日還有“與馬清臣談英國文字”，可見他開始頻繁地與周圍懂英語的西人進行交流。從 1866 至 1867 年間曾紀澤開始接觸英語，到 1871 年正式開始系統的英語學習，期間有三四年是時斷時續的。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曾國藩去世，曾紀澤在守制期間，更是把學習音符列為常課，並增加了習讀英文的時間。日記隨處可見其看、溫、抄、默寫、翻譯《英話正音》的記錄，如“夜飯後看《英話正音》”、“飯後譯英話”、“與

中譯英話”、“輿中看《英話正音》”等，“飯後批注《英話正音》極久。”不僅手抄《英話正音》，還“譯生者六條”、“另翻譯一行許。”甚至撫抱幼兒，仍“默學英語”不輟，<sup>⑦</sup>堪稱手不釋卷。以後幾乎每天都有翻譯英語的記錄，日記的天頭還有他所記的英文單詞及其漢文字義與英文短句。<sup>⑧</sup>

曾紀澤英語學習進步很快，光緒二年（1876），他已經能用英文同馬格里進行書面交談了，二月十三日他“寫西字函答馬清臣”。同年六月初三開始抄《自邇集》、誦《英語韻編》；並且“誦英語如課”。<sup>⑨</sup>光緒三年（1877）正月廿九“辰正起，誦《英語韻編》”，飯後又誦該書，夜飯後“看洋書《羅斌孫日記》”，<sup>⑩</sup>並閱讀新的教科書《英國話規》、《英語集全》等。曾紀澤學習英語鍥而不捨，他拜時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的丁韞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為師，每周都要去丁氏處兩三次，尋求有關地理、歷史與歐洲政治的信息，並請丁氏幫助批改他的英語文章。新年時曾紀澤還身穿貂皮裘袍和皮帽去拜訪丁韞良，頭上插孔雀翎、佩紅寶石頂戴，給其施弟子禮。<sup>⑪</sup>出使英法俄前夕，他在英語學習上用了大量時間。光緒四年（1878）七月十七日記：“卯正起，看英人小說。飯後，與松、栗久談。祈羅弗來，談極久。看英小說，批字典。至上房久坐。飯後，批字典甚久，批《話規》。復入上房坐極久。傍夕，批《話規》。”<sup>⑫</sup>

雖拜丁韞良為英文教師，但曾紀澤沒有正式進入語言學堂學習過外語，而主要靠自學。在學習過程中，他總結了一套獨特的方法，即利用自己精通漢語文字學的優勢，以掌握諧音批注英文字母，列成表格，來幫助理解記憶。如光緒三年十二月初八日記中就記錄自己“批注中國字母，以西洋字音之”，然後又“批注中國韻音，亦以洋字音之”。<sup>⑬</sup>1960年代台灣發行的《湘鄉曾氏文獻補》收錄了幾頁曾紀澤用過的字母注音影印件，應是曾紀澤首創這一注音法的佐證。<sup>⑭</sup>1878年，已經學了十幾年英語的曾紀澤，在為英國駐華使館翻譯梅輝立（William Frederrick Mayers）所作《大英國漢文正使梅君碑銘》中總結了自己的學習方法：“紀澤既嘗治形聲詁訓之學，則欲遠紹旁蒐，參稽異同。同治末年，結廬先太傅墓次，負土既竣，以吾舊時所知雙聲疊韻、音和韻隔之術，試取泰西字母切音之法，辨其出入而觀其會通。久之，亦稍稍能解英國語言文字”。他自謙這是“閉門造車”，不敢說“出門而合轍也”。<sup>⑮</sup>

## 二、曾紀澤的英語口語水平、閱讀訓練和英文寫作

正是由於曾紀澤刻苦努力，他已經能說一口基本流暢的英語口語，儘管不合語法，閱讀寫作也有一定的困難。<sup>⑯</sup>由於晚清大臣中通曉英語者實屬鳳毛麟角，因此曾氏的英語口語和寫作能力，都使他在外交活動中大顯身手，成為清政府派駐外國使節中最有才幹的一位。慈禧太后在光緒三年七月十六日和光緒四年八月兩次接見曾紀澤，都問及其外語能力，如光緒四年問道：“你能通洋人語言文字？”答曰：“奴才在籍翻閱外國字典，略能通知一點。奴才所寫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寫的，奴才還不能全懂。”問：“是知道英國的？”對：“只知道英國的。至於法國、德國等處語言，未曾學習。美國係與英國一樣的。”<sup>⑰</sup>光緒四年曾氏正式從北京出發前，慈禧還與他特地就學習外國文字有一段生動的對話，太后問：“你能懂外國語言文字？”對：“臣略識英文，略通英語，係從書本看的，所以看文字較易，聽語言較難，因口耳不熟之故。”問：“通行語言，係英國的，法國的？”對：“英語為買賣話。外洋以通商為重，故各國人多能說英國話。至於法國語言，係相傳文話，所以各國文札往來常用法文。如各國修約、換約等事，即每用法文開列。”問：“你既能通語言文字，自然便當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譯了？”對：“臣雖能通識，究竟總不熟練，仍須倚仗翻譯。且朝廷遣使外洋，將來成常局。士大夫讀書出身後，再學洋文洋話，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齒易轉、口齒難轉之別。若

遣使必通洋文洋話，則日後擇才更難。通洋文、洋語、洋學，與辦洋務係截然兩事。辦洋務以熟於條約、熟於公事為要，不必侵佔翻譯之職。臣將來於外國人談議公事之際，即使語言已懂，亦候翻譯傳述。一則朝廷體制，應該如此；一則翻譯傳述之間，亦可藉以停頓時候，想算應答之語言。英國公使威妥瑪能通中華語言文字，其談論公事之時，必用翻譯官傳話，即是此意。”<sup>18</sup>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能流利地使用漢語給曾紀澤以深刻的印象，慈禧接見他時，曾紀澤兩次提到威妥瑪“能通中華語言文字”和“華文華語”。<sup>19</sup>

1877年，在從上海到天津的外洋客輪上，曾紀澤就積極主動地見縫插針，操練英語口語：“初十二日，……夜至船主處，與船主及天津埠頭洋人馬斯坦久談”；“十三日，……除睡外惟尋洋人談耳”；“十四日，……午初至船頂，與二副滕伯斯衣一談，飯後與船主一談”。儘管與船主等人都不過萍水相逢，但曾紀澤還是樂於嘗試自己“中西合璧詩”的外交，在第十四日日記中記載，“作合璧詩一章，送船主，寫於宮扇，寫摺扇款四柄”。<sup>20</sup>文中絲毫不見當時士大夫階級的那種所謂的“矜持”，“飯後，與船主及美國駐京參贊賀而恐郭久談，與馬斯坦一談”。賀而恐郭，即美國傳教士、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十五日，……與船主一談，飯後復一談”。<sup>21</sup>

曾紀澤不僅持續不斷地鍛煉自己的口語水平，還積極鍛煉自己的英文寫作能力。在出使途中，他已經能夠順利地書寫各種“英文函”和“西字請帖”，將西人“所談洋話錄記簿中”，“擬英文照會稿”。<sup>22</sup>“寫一函答英國領事官達文波；夜飯後寫一函致傅蘭雅”。<sup>23</sup>作為練習英語的手段，曾紀澤寫過不少漢英合璧詩，這些“英華合璧詩”或“中西合璧詩”，堪稱為曾紀澤所首創。日記中最早出現的贈送西人的中西文韻詩，可能是光緒三年六月初三日他贈送給英國副領事嘉托瑪(G. T. Gardner)的中英文詩。<sup>24</sup>該詩文已不可考，但事迹見諸日記，“申正至陳寶渠處赴宴，英國副領事嘉托瑪、翻譯官施本思同席，久談，戌初歸。……作七絕一章，贈嘉托瑪，翻譯，仍可用西洋韻，亦詩中新格，前人所無也，經營良久始成”。“用西洋韻”，表明曾紀澤在詩歌創作過程中對如何表達中西的風雅頗費心思；“亦詩中新格，前人所無也”，表明曾紀澤對這種英漢合璧的體裁，雖覺得不合傳統，但心有戚戚焉。在如何表達這種新體裁方面非常慎重，初八日日記中記載，“作英華合璧詩，送英領事達文波，久而未成”。翌日，“辰初起。飯後將昨夜所作詩錄成”。他還另寫合璧詩給傅蘭雅，“作英華合璧詩送傅蘭雅。……飯後將所作送傅蘭雅詩錄於扇頭，良久乃畢”。曾紀澤不僅將這些“英漢合璧詩”贈送外人，還將自己所作的那些英漢合璧詩在官場宦友中展示，凸顯出他對這些“英漢合璧詩”的偏愛。光緒三年六月起，他不斷作“中西合璧詩”，或用手書的中西合璧書扇送贈中國的親友，如六月初六將“昨日所作詩寫於唐蘭生扇頭，兼中西兩體書，另作小跋識之”。除了唐蘭生，曾還將這種雙語體的格律詩送給友人、內閣學士陳寶渠，“作中西合璧詩一絕送寶渠……歸，寫連日所作中西合璧詩於摺扇，未畢”。<sup>25</sup>段懷清認為這種心態及行為背後反映出曾紀澤對於中國傳統文章之學的一種更開放、更自由的態度。<sup>26</sup>

曾紀澤的英漢合璧詩水平如何，學人們看法不一。

與曾紀澤同船赴歐的何天爵，曾在共同經歷的海上長途旅行中，收到曾紀澤贈送的一把漢英合璧詩的團扇，右邊上書：

中西合璧絕句一章奉贈

大美國參贊大臣何天爵大人雅鑑

大清國候補京堂一等毅勇侯曾紀澤拜手

黑洋渡盡海潮紅，與子高談市舶中。  
紈素新詩君握取，雪泥指爪認飛鴻。

左邊橫寫英文：

For the Secretary of the United State Legation Holcombe  
Past the black ocean, admire  
The water are become red;  
Very glad to meet you, and  
Converse on the Captain' s bed,  
Written an ode on the fan of  
Silk should be Graph in your hand.  
Like the claw of birds, to print on the snow and sand.  
Written by Marquis K. J. Gearthon of Tseng

何天爵稱讚曾紀澤的“英語學習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扇面上的一筆一劃都是他用普通的毛筆寫成。英文詩如同他寫的漢字一樣漂亮流暢，無論在其風格還是書法方面都堪稱上乘。當我們想像一下曾紀澤先生所使用的書寫工具時，再看一下扇面上他寫的英文，的確讓人拍案稱奇。其中的‘黑洋’（the black ocean），指的是海上的大霧，它曾使侯爵先生驚異不已；‘紅流’（the red water）則指的是標誌我們的旅途終點的一條河流入海口的混濁泥流。‘船長的床’（the Captain' s bed）指的是我與曾紀澤先生坐在一起一談就是數小時的一張沙發，那張沙發本來放在船長室，但在旅途中它成了我的專用品。”<sup>27</sup>

而當曾紀澤將雙語題詩的團扇贈送丁韞良，丁氏在《花甲憶記》中卻這麼寫道：“不知是因為隔絕（他使曾缺乏比較的機會），還是因為奉承（貴族總少不了有人奉承，所以自我膨脹），曾紀澤對自己的英語水平非常自負，常常向朋友贈送雙語題詩團扇，詩是他自己創作的。……中文原詩深得風雅，但其譯文則是典型的‘巴布英語’。”<sup>28</sup>“巴布英語”即洋涇浜英語。丁韞良在書中全錄這一段漢英合璧詩和曾紀澤手書的宮扇照片：

學究三才聖者徒，識賅萬有為通儒。  
聞君兼擇中西術，雙取驪龍領下珠。  
To combine the reasons of Heaven, Earth, and Man,  
Only the Sage' s disciple, who is, can.  
Universe to be included in knowledge,  
All men are, should,  
But only the wise man who is, could.

丁韞良強調這是曾紀澤學習英語初期的作品，而且說明曾並未進過同文館當學生，並特別指出曾紀澤的英語口語雖然流暢，但不合語法，閱讀、寫作卻總有困難，指出曾紀澤那一點英語能力使其在社交活動中大佔優勢，以至成為中國派駐外國首都最有才幹的使者。<sup>29</sup>

不管時人如何評價，曾紀澤自己對創作英漢合璧詩樂此不疲。光緒三年六月“十七日，……飯後復久坐，錄合璧詩一章……亥正歸，錄合璧詩一首”。“十八日，……飯後寫致思臣函畢，錄英華合璧詩二首”。<sup>30</sup>“二十日，……飯後寫屏幅四紙，宮扇二柄，寫西字函答馬世登”。<sup>31</sup>這裡的“西字函”和“屏幅”、“宮扇”是否寄同一人，難以確認，但用英文寫信，寄給相識或陌生的西人，似乎已經成為

曾紀澤當時正在嘗試的一種外交交流手段。而這種英漢合璧式詩文外交的效果還是明顯的。廿一日，接到“西字函”的馬世(士)登就來曾紀澤下榻處拜訪了，“小睡，馬士登來久談”。廿二日臨睡前，又有“西字函”寄馬士登。<sup>②</sup>又八月初五日，“夜飯後作合璧詩，贈美國參贊大臣何天爵，未成而睡”。<sup>③</sup>初六日，“繕昨日所作合璧詩”。<sup>④</sup>九月二日，“將前月所作送何天爵詩改訂數字，用中西二體字書於宮扇，良久乃畢”。<sup>⑤</sup>

段懷清指出，曾紀澤努力在探尋中西之間可能的契合點，並將這種契合落實到中西詩歌或文化之間的“合璧”、“合體”。在漢語語境中，“合璧”乃祥瑞之徵兆，而“合體”亦意味著矛盾衝突的調和解決。在晚清中西之間直接衝突甚至戰爭不斷的時代處境當中，曾紀澤的這一中西“合璧”、“合體”的思想立場，以及積極探索吸收中西文化之精華的具體實踐，就顯得尤為難能可貴。<sup>⑥</sup>作為外交官的曾紀澤，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衍伸出一種創作“中西合體詩”的新詩體，這種審美認識與雙語文學表達的實踐，在當時確屬前衛，讓他成為晚清中國第一位公開使用“中西合體詩”進行所謂“詩歌外交”的職業外交家。

### 三、曾紀澤學習英語所使用的教材與讀本

丁韞良在《花甲憶記》中稱，曾紀澤“遠居於內陸，幾乎從未見過白種人，主要靠語法和詞典學習英語”。<sup>⑦</sup>說其從未接觸過洋人，顯然不確；但認為曾紀澤學習英語主要靠語法教材與詞典，這一判斷確實不假。曾紀澤的英語學習主要是通過英語教材、讀本來進行自學。1869年來華的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國佬》一書中寫道：曾紀澤是一位出類拔萃、孜孜不倦的學者，在沒有教師的情況下，花費了3年的時間努力自學英語。他所藉助的英文讀本有《聖經》、《韋氏大詞典》和《讚美詩選》( *Select Hymns* ) 以及一些習字本。<sup>⑧</sup>

筆者感興趣的是，除了何天爵提及的讀本和詞典外，曾紀澤在英語學習中究竟還利用過哪些英文讀本呢？光緒三年二月七日，曾紀澤日記中最早出現了他查閱英語字典的記載，“辰初二刻起，翻考英國字典”。<sup>⑨</sup>“辰初二刻”，即早晨七時起床之後即溫誦英語，持之以恆，勤勉如斯。同治十年十一月初九日記記有“看外國字書”，但未說明是何書。<sup>⑩</sup>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初五起，從曾紀澤的日記可見，他比較頻繁利用的基礎讀本有《英語正音》、《自邇集》、《英語韻編》、英國或英人的《話規》、《英華初學》、《英語入門》和《英字入門》等；讀過的英文書有《英語初學編》、《英華萃林韻府》、英字《羅馬史記》、《羅斌遜日記》、<sup>⑪</sup>《華英說部》、《英華字典》、《英國大字典》、西國經、西洋新聞紙、英人教門書、英文耶穌書、英人啟蒙文字、吳子登的《翻譯小補》等，並不斷“翻閱英國字典，考究字義”、“抄英語”、“溫《英語韻編》良久”、“批《英國話規》良久”，“看《英語入門》良久”，“閱上海曹潤甫《英字入門》”，“閱英人啟蒙文字良久”，“看《英華初學》良久”，“閱英文寓言”，以及各種“英人小說”。遺憾的是，曾紀澤幾乎從來不寫出英文小說和英文寓言的書名，只有一次他寫出“閱溟名士‘遂夫特’之文”，鍾叔河認為這是名小說家斯威夫特之文。<sup>⑫</sup>上述曾紀澤所用的早期英文讀本，不少我們今天已經很難尋覓了。

最早使用的英文學習讀本是《英語正音》，該書從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五起，前後讀了約半年之久，之後又不斷溫習。<sup>⑬</sup>《英語正音》可能就是英人麥嘉溫(John MacGowan)所編的《英語正音》(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862年在上海出版。該書分兩冊，首冊列出漢語詞彙，然後標出英語，接著用中國字加注讀音，該書按中國的分類分為28部分；第二冊是長句讀法。該書有三個前言，後附英文字母表。1862年11月25日《上海新報》111號頭版有該書的售書廣告。

曾紀澤接續使用過的重要英語讀本是《自邇集》和《英語韻編》。光緒二年六月初三起，他開始“鈔《自邇集》”、“誦《英語韻編》”，不僅在“輿中”，也在“舟中”誦讀，《英語韻編》一直到光緒四年四月還在溫習。光緒二年六月他開始“飯後看英國《話規》”、“看英人《話規》”。<sup>44</sup>他還對“《話規》中之名目數種”特別有興趣，光緒三年十二月初一，曾到英國傳教醫師德貞(John Dudgeon)那裡“久談，以所鈔《話規》名目問之”。夜歸後還意猶未盡，“查英國字典，注釋《話規》名目”。<sup>45</sup>《自邇集》是曾紀澤不斷查檢的一本書，光緒四年三月至五月間、光緒五年(1879)三月至閏三月間經常閱讀，有時飯前讀過，飯後再讀，一天兩次“看《自邇集》良久”。<sup>46</sup>威妥瑪曾撰有《語言自邇集》和《文件自邇集》。“自邇”一詞採自《禮記·中庸》的“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取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之意。《語言自邇集》(*Yü-Yen Tzu-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原是為來北京的英國公使館和直隸衙門的英人學習北京官話而編寫的教材。作為給外人學習漢語的教科書，該書成功地發展了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方法，第一版1867年出版於倫敦，全書分四卷八章：語音聲調、部首字形、散語即詞彙用法、問答談論、詞類(詞性分析)等，除屬於閱讀的散語章、問答章和談論章外，還有根據《西廂記》改編的《秀才求婚》的故事。其中有北京官僚階層的對話、外交訪問和宴會時的談話，以及外國官員與中國僕役的各類情景對話等，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北京話口語為描寫和研究對象，用拉丁字母標記北京口語聲韻調的實用教科書。第二版出版於1886年，第三版出版於1903年，顯然曾紀澤1878年用的應該是1867年的首版。《文件自邇集》(*Wen-Chien Tzu-Erh Chi: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也是1867年起出版於倫敦。全書原計劃出版包括公文、信函、奏疏等類型的漢英文注釋本兩卷，但直至1879年正式出版了一卷。該書收錄各種文書檔案75種，附錄注釋書一冊，凡148篇範文，是為了輔助西方人士掌握中國官方文件的書面語言而編纂的。<sup>47</sup>

光緒三年十一月十五、十六日，曾紀澤“看《英語集全》良久”和“翻閱《英語集全》”。<sup>48</sup>顯然是唐廷樞著，唐茂枝、唐應星參校，陳恕道、廖冠芳同訂的《英語集全》，1862年由廣東緯經堂出版。全書六卷，原定名《華英音釋》，出版時更名，用粵語注音，有詳細的“切字論”和“讀法”說明。書前有英文序、張玉堂序，廣東緯經堂1862年刊本上題寫羊城唐廷樞景星甫著，兄植茂枝、弟庚應星參校，陳恕道逸溪、廖冠芳若谿同訂。全書共六卷，該書在上述數十個門類下收錄英文詞彙、短語、簡單句子多達6,000個以上，以漢字字句為主，然後列出英文字句，下以中文注英文譯音。這是一部兼備詞典和教科書性質的綜合性的著作。光緒四年八月十四日曾紀澤日記中有“看《英語入門》良久”<sup>49</sup>，估計是《英字入門》一書的誤寫，光緒五年正月十一日有“閱上海曹潤甫所著《英字入門》”。<sup>50</sup>曹驥編譯的《英字入門》，申報館同治十三年(1874)印行。全書分十則：英字源委；單字門；二字拼法門；三字拼法；四五六字拼法；七字以外拼法(言語附)；數目字門；點句勾股及異體字考；學語要訣；補論英語六則等。

曾紀澤日記光緒七年(1881)八月十九日記有“閱吳子登所著《翻譯小補》”，光緒十年(1884)九月十五、十六、十八日都有類似記述。<sup>51</sup>該書作者係吳嘉善，字子登，江西建昌府南豐縣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舉人，咸豐二年(1852)進士。作為翰林院編修，他發憤自學外文，曾紀澤曾列舉他的學習方法：“吳子登太史口不能作西音，列西字而以華音譯讀，是為奇法，其記悟亦屬異稟，非人人所能學也！”(《使西日記》卷一)他在算學上有獨特建樹，著有《九章翼》、《天元一術》等21種。後隨同陳蘭彬赴美，擔任留美幼童肄業局監督，與容闈交惡，成為幼童撤回的罪魁禍首。<sup>52</sup>吳子登不斷出現在曾氏日記裡，如光緒五年十二月廿三日，與來訪的吳子登“談極久”。飯後於蘭亭久談，可能

還不盡興，於是偕春卿、子興再到吳子登處，然後一起去“農器賽奇會場遊觀極久”。<sup>53</sup>吳子登編著的《翻譯小補》，初版時間不詳。該書成書一定在光緒七年八月前，後有商務印書館 1907 年 1 月版，英文書名 *The Translation's Assistant by Wu Kia Shan*。1939 年還編入“英文自修叢書”重印。該書是一本講解如何翻譯英文短語的小書，選錄常用英語單字和成語數百個，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以英漢對照形式說明其漢譯法。如 A：“此字尋常用者，可譯以‘一’字，或缺不譯，但有時作貫串字用，意同 to, at, on, in 或 of 者，當融會其意譯之。”舉例有“Who set this clock a going?”（誰令鐘走？）內容包括算學、化學、機械等方面。

曾紀澤使用過不少英漢詞典，華英詞典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要數美國傳教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的《英華萃林韻府》（*A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福州 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 1872）。該詞典由三部分內容組成，其中第一部分為第一卷，第二、三部分為第二卷，全書計 1,243 頁，封面扉頁列中、英標題，共收錄了 66,000 個中文詞組、175,000 個中文單詞，涉及西學、歷史、民俗、律例等中英文對譯詞。<sup>54</sup>《韻府》不只是一部單純的英漢字典，還是一部小型的綜合性百科詞典。曾紀澤對該書特別重視，光緒三年，時任湖北布政使的潘霽拜訪曾紀澤，曾氏向好友專門推介了《英華萃林韻府》。潘霽在《韓園自訂年譜》中寫道：兩人“晤談，知其習外洋文字五年矣，並云：‘《英華萃林韻府》一書不可不令子弟早肄，他日備朝廷之使。一事不知，儒者之恥，未可與拘墟者同年語也！’”<sup>55</sup>此足見曾紀澤對該書的重視。

有意思的是，曾紀澤還看過一些英國人寫的關於中國的文章和翻譯的中國名著，如他曾“閱英人海爾伯爾塔吉爾師所譯《聊齋志異》數段”，“看《華英說部》”，“閱英人格蕾著《中國紀略》”，“看英文《中國記》”，“閱英人某所著《亞細亞記》”。<sup>56</sup>其中《華英說部》可能是羅伯聃（Robert Thom）的《華英說部撮要》（*The Chinese Speaker*，又稱作 *Extracts from works written in the Mandarin Language, as spoken in Peking*），1846 年寧波華花聖經書房初版。現僅見之 Part I（卷一）又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有二十段，包括日常、擇交、雜話、廳堂、擺設、官話品、身體、形容、稱呼、衣服、應酬雜客、病疼、動靜、訓童、珍重、鬧臭話、即景、酒食、省儉、勸學儀注等，多是日常生活用語。第二部分有四節，一是“見面常談”，多為交際應答之成語；二是“問答”，日常小對話；三是《紅樓夢》第六回翻譯；四是《家寶全集》中“和夫順妻”一節的翻譯。書中不僅可以看到初期漢英對照的譯文，還可以瞭解當時中國人的普通口語，如：“你忪這麼疼我，這麼抬愛我，這麼栽培我，我還沒有補你的情呢！”這裡的“你忪”就是今天的“您”的前身。全書應是羅伯聃根據高靜亭的《正音撮要》上卷譯述的，該版本有中英文兩個封面。該書還有 1880 年點石齋石印本，書名改為《華英說部撮要》，注明為上卷，序言中稱係據“禿唔君”“原本重為校印”。書前有英國美查（F. Major）的序言，謂：“清國龍與東土文字與華人異，入關定鼎後有命諸翰林肆司華文，此聖代同文之治也。惟中國言語以中州音為正，僅習一方之土語總不能因應咸宜。於是與精於滿洲文字者，先取中國平常日用之官音及《紅樓夢》、《傳家寶》等諸說部摘錄成集，而以左行國語譯於其右。都中人士咸以此為無價之珍。迨我英國與清國通商以後，中華人士又有專心致志於英文者，而英人來華亦或以不識華文為恥，前領事官禿唔君遂即是書刪去滿文，即華字而譯以英語。中英兩國之欲互習其語者，遂幾家置一編，乃十餘年來風霜剝蝕板頁無存，僕頗惜之愛，不憚煩瑣、訪求原本，重為校印，俾禿唔君一片苦心，不致日就湮沒，是則區區之微志也。若謂為老馬識途則吾豈敢！”曾紀澤所用的疑是 1880 年點石齋石印本。

光緒九年（1883）五月二十四日“英領事駐廈門者翟爾斯來一談。”<sup>57</sup>翟爾斯即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同年十月十七日記有“閱英人翟爾斯所譯《古文選珍》”，廿三日記有“閱翟爾斯所譯古文”。<sup>59</sup>《古文選珍》(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 是指 1883 年由編者自費出版，1884 年一卷本《古文選珍》在其友人伯納德·夸里奇 ( Bernard Quaritch ) 幫助下，由倫敦 Bernard Quaritch 和上海別發洋行 ( Shanghai: Kelly & Walsh ) 分別出版的中國文學選本。翟理斯在該書中首次翻譯了不同時期中國著名作家優雅的散文片斷。該書封面有用篆書題寫的“古文選珍”，封底是一篇中文短序。每位作者都有一簡明扼要的生平介紹。全書的特點是選取的作品較多，大抵以朝代先後，選取先秦至明末 52 位作者的 109 篇作品，題材豐富多樣，或傷感，或激昂，或抒懷，或寫景，長短不一。<sup>60</sup>

段懷清稱：“這一具有明顯差異性和多樣性的書單，反映出一種新的不同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之間對話及組合的意圖。這一意圖，也似乎隱含著一種知識上、思想上乃至文化上自我超越與自我突圍的意味，甚至也可以說，它已經初步呈現出曾紀澤在自我文化身份認知和選擇上的反觀與批判自覺，以及已經在付諸日常實踐的自我擴展與超越的面向及努力。”<sup>61</sup>

#### 四、推介《英文舉隅》、撰寫英文長文《中國先睡後醒論》

曾紀澤也是晚清最早提出中西互派教師的公使。光緒五年閏三月初五，他在日記中寫道：“余嘗謂：中國辦洋務，必須多得通達外國情形之人，並於中國設立學塾，聘洋人以教中國子弟之好西學者。又宜於英、法、德等國設立中國學塾，擇中華績學之士，以教洋人子弟之向華學者，久者聲氣相孚，可以抉幽洞微，暗獲助益。”<sup>62</sup>他非常關心京師同文館的外語教育，曾與該館英文學員左秉隆 ( 字子興 ) 一起探討語法分類，受益匪淺，慨嘆“子興考論其例甚精，非余所及”。<sup>63</sup>光緒十二年 ( 1886 ) 十二月十七日，他曾“至同文館監學生大考，偕沈仲復點名散卷”，並和丁韞良一起“閱英文卷良久”。<sup>64</sup>其中最突出的工作是推介英文讀本，即為汪鳳藻編譯的《英文舉隅》撰寫了序言。

《英文舉隅》是京師同文館出版的中國近代第一部國人翻譯的英文文法書，曾紀澤不僅是翻譯的促成者，還為該書作序並鄭重推介。《英文舉隅》的主要翻譯者汪鳳藻曾在上海廣方言館隨林樂知學習英語，修業期滿後轉學京師同文館。在北京他仍然保持了出色的成績。據第一次同文館題名錄所載光緒四年兩科考試中年歲試榜單，汪鳳藻的英文居全館第一，漢文算學居第二。後因成績優異，升任算學副教習。先後參與譯著《公法便覽》、《富國策》、《新加坡刑律》等。光緒四年正月十三日曾紀澤與汪鳳藻“談極久”，二月十一日又與汪和席涵伯“久談”，<sup>65</sup>恐怕都是與《英文舉隅》一書有關，同年九月二十一日為《文法舉隅》作序。《英文舉隅》為英人柯爾 ( Simon Kerl ) 的 *English Grammar* 。柯爾著有多種文法書，早為中國一些西學學者所重視。管理同文館事務大臣曾紀澤在為該書譯本所寫的序言中指出：“數十年來，中外多聞強識之士，為合璧字典數十百種。或以點化多少為經，或以音韻為目，或以西洋字母為序，亦既詳且博矣。然而說字義者多，談文法者少”。因此，曾紀澤曾計劃編譯英文文法書，但“紛紜鮮暇，因循遂已”。與汪鳳藻就這些問題“縱談既洽”，因此希望汪鳳藻能翻譯英文文法書。結果一個月後，汪鳳藻就拿出了譯稿。曾紀澤讀後認為“雖視縷證據未逮原書，然名目綱領大致已備，亦急就之奇觚，啟蒙之要帙也”。該書初名《文法舉隅》，光緒五年由同文館出版時改名《英文舉隅》。全書分二十二節，前九節分別討論英語的靜字 ( Noun, 名詞 )、代靜字 ( Pronoun, 代名詞 )、區指字 ( Article, 冠詞 )、系靜字 ( Adjective, 形容詞 )、動字 ( Verb, 動詞 )、系動字 ( Adverb, 副詞 )、縮合字 ( Preposition, 介詞 )、承轉字 ( Conjunction, 連詞 )、發語字 ( Interjection, 感嘆詞 ) 等，從第十節開始分別討論用字之法、造句之法、辨偽；章句條分；同字異用；標點符號的使用、拼音簡例、略語和倒句等。

曾紀澤在為該書所撰寫的序言中還批判了當時一些保守的士大夫關於“事非先聖昔賢之所論述，物非六經典籍之所紀載，學者不得過而問焉”的謬論。他認為：“上古之世不可知，蓋泰西之輪楫旁午於中華，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也。天變人事，會逢其適，其是非、損益、輕重、本末之別，聖人之所曾言，學者得以比例而平駮之；其食飲、衣飾之異，政事、言語、文學、風俗之不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見聞，當時存而不論，後世無所述焉，則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擴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則考求各國語言文字，誠亦吾儒之所宜從事，不得以其異而諉之，不得以其難而畏之也。”<sup>66</sup>

曾紀澤在海外世界的聲譽，還與他撰寫過一篇英文長文有關。他曾參與中英鴉片交易加稅免釐問題和朝鮮、英國強佔緬甸等問題的對外交涉。1883至1884年，曾紀澤在巴黎就越南中法戰爭事務與法國政府進行談判，立場強硬，但由於越南戰事不利，清廷意圖主和，1884年4月，曾氏被解除駐法公使職務，1885年6月卸任駐英俄公使職務。曾紀澤在倫敦結識了一些英國新朋友，其中包括一個名叫鮑爾吉(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的著名記者，此人對亞洲問題尤感興趣，從1881年到1884年，陸續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國歷史》(*History of China*)。1885年，他與別人一起在英國倫敦創辦了《亞洲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在鮑爾吉的策劃下，曾紀澤回中國前完成了《中國先睡後醒論》，以此來表達對英國的惜別之情。曾紀澤於1886年8月27日從德國回到倫敦，9月8日離開英國。因此，這篇文章的寫作時間應當是在1886年9月1日前後，他口授英文綱要予馬格里，並合作起草，撰寫了*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一文，發表在1887年1月出版的《亞洲季刊》第一期。<sup>67</sup>這一期《亞洲季刊》的主編，即鮑爾吉。在該期雜誌出版之前，鮑爾吉也作了一些前期宣傳，將《中國先睡後醒論》主要觀點在其他報刊上進行披露。之後《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也刊登了《中國先睡後醒論》的摘要；《曼徹斯特衛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還就此發表了一篇社評。因此，在曾紀澤的這篇文章刊出之前，許多人就已翹首以待了。曾紀澤收到《亞洲季刊》發表的《中國先睡後醒論》後，曾讓同文館的一個學生將其譯成中文，但現在我們所見最早連載於1887年6月14日和15日《申報》上的漢譯本，是由顏咏經口譯、袁竹一中文筆述的，該文有如下小序：“曾劼剛侯部前使英俄時，曾著《中國先睡後醒論》。論中縱談中西交涉諸事，俱中肯綮。倫敦書籍館業經刊列《四季報》內，歐洲諸國傳誦一時。凡我薄海士民，諒亦以先睹為快。偶於公暇，譯成華文，用供眾覽。原文多引西國舊典，間採古諺語及借喻語。翻譯之法，總以悉遵本文意義、不加改竄為主。今篇中未免羸雜英國語氣。職是之由，閱者不以辭害志也可。”<sup>68</sup>

《中國先睡後醒論》中譯文3,885字(不含標點)，《申報》並未連載完全文。全文大約談及五個問題：

第一是批駁歐人所謂中國已“元氣虛耗，無可設施，惟有坐而待亡”。他指出“古來富強之國”的中華是否如歐人以為“古所疏鑿之洪流巨川四通八達者，今多湮塞；昔所傳金石土木之工堅致鉅麗，今日只存遺跡，剝落損壞，無復完美，且作法多有失傳者”，“遽謂中國即一陵夷衰微終至敗亡之國”；“國古昔之盛，與近今之衰，判若霄壤，遂疑中國精力業已消鑠殆盡，將近未造，難支他國爭勝之勢”。而曾氏認為“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

第二是說明何以中國先睡後醒。他認為近世國人的昏睡緣於受“文教均不如中國之懿美”的誤導。歷史上諸邊藩屬常遣使臣，進其方物，給國人帶來了幻覺，“自以為金甌永固，固無待捨舊而謀新。兼之其他強大之國，遠隔重洋，相去遼闊，彼中興亡得失、和戰攻守，漠然不知，以致中國絕無

留意於海外諸國之事者”。鴉片戰爭使國人開始驚醒，“沉睡之中國，始知己之境地，實在至危至險，而不當復存自恃鞏固之心”。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焚燒了圓明園，中國已從昏睡中驚醒，將逐步倣仿西洋，整軍經武，力求自強。

第三，他例證中國被喚醒的過程，認為五口通商“略已喚醒中國於安樂好夢之中，然究未能使之全醒”。“圓明園之火，焦及眉毛，俄國之僭伊犁，法國之吞東京，始知歐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勢極形危險。……始知他國皆清醒，而有所營為，己獨沉迷酣睡，無異於旋風四圍大作，僅中央咫尺平靜”。因此，“中國忽然醒悟”。“中國能順受其顛沛，而從中漸復其元氣，如帆船之航海，將狂風所損壞之物，悉從船面拋去，修整桅舵，以將殺之風，作為善風，乘之穩渡。若此之國，不可謂為將滅之國。”

第四，他闡明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主張正義之國：“蓋中國從古至今，只為自守之國，向無侵伐外國之意，有史書可證。嗣後亦決無藉端挑釁、拓土域外之思。夫他國每欲奪人土地，奪之而不用，欲用而不能。若中國則不然。且中國本無人滿之患，無須別尋新地，以為遊民寄居。歐人謂其國人多於地，不能不覓新地以安置其人，非篤論也。”中國人謀衣食於古巴、秘魯、美國及英國屬地是為兵燹之勢所逼，中國的滿洲、蒙古、新疆，均有寬闊荒地，向無農工開墾者，國人丁雖興旺，即安插之，而尚有餘地，所以國人原無需謀食於外國。一旦中國設立製造業，開礦建鐵路，移民墾荒，一切會臻於完善。

第五，他提出目前中國所最應整頓改革的若干措施：（一）善處寄居外國之華民，以《萬國公法》為依據，要求外國政府採取措施，寬待華民，保護華僑的利益。（二）申明中國統屬藩國之權，設法照顧保護藩屬國的利益而不受西方列強的侵蝕。修改不平等條約，欽派大臣經理其事，藉以維持大局。如有侵奪該藩屬土地，或干預其內政者，中國必視此國為敵國。（三）重修合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對劫奪中國土地的不平等條約，不能置之不問。最後他呼吁：“亞洲之諸國，彼此常有嫉妒，甚有過於歐洲之忌亞洲者。亞洲諸國有同患之情，不應嫉心相視，自宜協力同心，務將西國一切交接，基於國誼而立之國約，非基於敗衄而立之各約。”曾紀澤在國家積貧積弱、備受欺凌的時候，面對西方列強的卑視和譏諷，挺身而出，向世界宣稱中國人必然從睡夢中警醒，表現了一個正直的中國外交官強烈的愛國心和民族自信心。

英文本在倫敦《亞洲季刊》發表後，首先在海外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反響，上海的《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天津的《中國時報》（*The China Times*）、倫敦的《旁觀者》週刊（*The Spectator*）等紛紛發表評論。<sup>⑩</sup>美國中國學家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在其《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一書中，強調在19世紀大談“睡獅中國”將要崛起的正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具體而言，就是從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開始的。石川禎浩指出，《中國先睡後醒論》一文中雖未提及“睡獅”的字眼，但在將國家比喻為動物時，的確提到過“獅子”。《曾惠敏公遺集》收錄的《為潘伯寅大司空畫獅子紈扇率題一首》中有這樣一段：英吉利國稱雄泰西，軍國大纛及宮廷印章，皆雕繪獅子與一角馬為飾，殆與俄羅斯畫北極之熊，佛朗西、日耳曼畫鷹隼者，各有取義。……法尚蒼鷹俄白羆，英蘭旌旆繪黃獅。在此曾已清楚地寫道獅子是英國的象徵（白熊和鷹隼分別是俄、德的象徵）；而另一首詩的“引”也稱“獅子毛群之特，蹲伏行卧，往來前卻，喜怒饑飽，嬉娛攘奪，狙伺搏擊之變相，尤著意焉”。就獅子的形象產生某種想像給後人以意象的啟示是可能的。<sup>⑪</sup>

## 五、結語

晚明至晚清，徐光啟一代堪稱最早睜眼看世界的學者，很少有願意為直接瞭解西方而學習外語者。晚清是中國文化重要的轉型時代，較早接觸西人的大臣林則徐，開始意識到學習西語的重要性。1839年3月至1840年10月間，他到達廣東出任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時，曾組織譯員梁進德、袁德輝等從事翻譯活動，他在閱讀域外文獻時，也學習過一些英語和葡萄牙語的詞彙。<sup>⑦</sup>但在清廷大臣中，系統進行英語學習並取得突出成績者是曾紀澤。

19世紀的世界，英語在西語中已經取得了霸權的地位。但在中國官場，學習外語並非值得炫耀的光彩之舉。即使在中國的外交場合，這一優勢似乎也沒有給曾紀澤個人的際遇帶來太多的好處，反而惹下了不少麻煩。1887年1月7日，從歐洲歸國不久的曾紀澤與總理衙門大臣及各部尚書一起向駐京的法、德、比、美、英和日本等各使館外交官道賀新年，當他進入日本公使館見到鹽田三郎公使以及其他使館人員時，首先說了一句“Happy New Year”，這是鹽田公使頭一次在北京聽到一個清朝官員用英語向他道賀新年，覺得又驚又喜。同來的總理衙門大臣和各部官員很多並不知道曾紀澤所說英語的意思，但他們都對此大為不滿，認為堂堂清朝大員不應對小日本公使說鳥語。當他們從翻譯那裡得知曾紀澤是用英語向東洋人道賀新年，更覺得有失體統。<sup>⑧</sup>

作為清末官場少有的較早學習英語的高級官員，曾紀澤的英語學習起始於1866至1867年間，系統開展於1871年。在晚清宮廷中，他較之光緒皇帝學習英語（光緒十七年，1891）要早20多年；<sup>⑨</sup>較之戊戌變法時期張元濟、蔡元培等新派進士學習外語也早了近30年。且曾紀澤的英語學習有著相當的成效，其水平給時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陳熾在《庸書·西書》中指出：“以故通商用兵，垂數十年，欲求一緩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皆由學問之士不達西文，浮薄之徒鄙夷中法，其兼通總貫如曾紀澤者，蓋概乎其未之有聞也。”<sup>⑩</sup>能流利地運用英語，為曾紀澤的外交活動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他還能直接審閱“譯官所譯海道輿地圖名”和“批所閱西字函應覆之語”。<sup>⑪</sup>光緒六年（1880）七月十七日，他和日本新任駐俄公使柳原前光先後拜見俄皇，“詞色甚悅”的俄皇以英語與曾紀澤“閒談數句”，還與隨員慶常用法語交談。在遍拜隨扈各大員時，禮官對柳原前光“漠不照應，相待殊有軒輊”。曾紀澤認為“似因柳原前光不能作英、法語，故各官無由與談，又不欲屢呼譯官也”。<sup>⑫</sup>曾紀澤堪稱近代中國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荷蘭學者保爾·密爾茨（Paul W. Meerts）指出，一名卓越的外交官，首先需要熟練掌握外語以及專業知識。意即對於外交官來說，專業的技能包括：一是能用熟練的外語進行有效的溝通；二是熟悉國際法等法律專業知識且能運用自如，精確地加以表達。<sup>⑬</sup>晚清駐外公使通曉西語者鳳毛麟角，不懂外語，常常會在外交活動中吃虧。曾紀澤利用自己語言上的優勢，在擔任駐英、法公使後，與英國談判議定了洋藥稅釐並徵之條約，經其力爭，最終為清政府爭回每年增加煙稅白銀二百多萬兩，豐盈了國庫。

在曾紀澤先後八年的外交官生涯中，最令人稱道的是他與俄國的艱難交涉。清政府於1878年6月派吏部侍郎崇厚為全權大臣出使俄國，與沙皇政府直接交涉。由於崇厚沒有制定相宜的談判原則和提出確實可行的交涉方案，終在沙俄代表的軟硬兼施、威脅愚弄之下，於1879年簽訂了《中俄交收伊犁條約》（因為在俄羅斯的利伐第亞 Livadia 所簽，又稱《利伐第亞條約》）。根據此約，沙俄歸還伊犁，但要割去霍爾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領土，同時要求清政府向俄國賠款500萬盧布。名義上伊犁地區歸還了中國，而實際上卻只換回一座險要盡失、四面被圍的伊犁孤城，對整個中國西部邊疆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消息傳回國內，朝野一片嘩然，清政府明確宣佈拒絕

承認該條約並且對參加談判的崇厚治重罪。為將不利影響降至最低,清政府於 1880 年 2 月任命駐英、法公使曾紀澤兼任駐俄公使,與俄國重開談判。曾紀澤受命後,首先著重於覓求英國的幫助,先後訪晤英國外相葛蘭裴爾(Earl of Granville)、新組閣的英國首相格蘭斯登(William E. Gladstone)和俄國駐英國大使勒班諾甫(Aleksei B. Lobanov-Rostovsky)。之後從倫敦啟程,經巴黎,取道柏林抵達俄國首都聖彼得堡。他在談判桌上針鋒相對,與沙俄談判代表格爾斯據理力爭,終於迫使俄國政府修改條約。他代表清廷與俄國政府簽訂了《中俄改訂條約》(亦稱《中俄伊犁條約》),與崇厚所簽訂的《利伐第亞條約》相比,新約在原條約的基礎上做了有重大意義的修訂:將中國對俄賠款增至 900 萬盧布,索回了伊犁南境特克斯河西岸長 400 里、寬 200 餘里的廣大地區,同時不得不割去霍爾果斯河以西的廣大地區,以交換被俄國所侵佔的伊犁。《中俄伊犁條約》雖然仍是一個不平等條約,但是和《利伐第亞條約》相比,挽回了中國一部分領土與主權,最大限度地維護了國家的權益和尊嚴。在當時腐弱的清政府內外不利的情况下,“實係中國外交上的一大勝利”。曾紀澤在談判過程中,蒐購了所有中俄相關邊界的界圖,詳加研究,以避免在決定界址時發生錯誤。在新議條約大綱確定後,對於各項小節仍絕不忽略,字斟句酌,不惜多方力爭。因為伊犁條約係以法文為正本,他親自督導細校,因為駐俄國使館的人手不夠,該約漢文本的一部分也由他親自謄寫。連與他談判的沙俄對手格爾斯也對他的人品、才智和談判技巧表示出尊重之意,讚揚說:“以貴爵才智,不惟出眾於中國,亦罕見於歐洲,誠不可多得之使才也。”<sup>④</sup>

曾紀澤也是近代中國英語教學史上的引導者。正是在他學習英語的不懈努力下,差不多經歷了 20 年後,清朝官員對外語的看法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到了 20 世紀初,在中外交往的官方場合,說英語成為一種時髦。在漢口美國領事館 1905 年舉辦的宴會上,美國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發現“以前從未參加過這麼多中國官員都講英語的聚會”。<sup>⑤</sup>在曾紀澤的影響下,妹夫陳遠濟、胞弟曾紀鴻及同鄉學子幾人都相繼學起了英文,並紛紛請大哥教授學習方法。李提摩太稱曾紀澤的好幾個兒女“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很高興有外國人前去拜訪他們”。<sup>⑥</sup>曾紀澤的英語學習,為晚清外語教學風氣的開創,居功至偉!

①④吳相湘:《晚清宮廷與人物》,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9年,第209~211頁。

②⑤⑥⑦⑧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第10、19~21頁;第10、19~21頁;第271~284頁;第61~160頁。

③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劉志惠點校輯注、王澧華審閱:《曾紀澤日記》上册,長沙:嶽麓書社,1998年,第113~158頁;第158~159、268~308頁;第440頁;第580~629頁;第170頁;第268~310頁(以下凡引用此書,僅注書名、冊數、頁碼)。

⑥鍾叔河匯編校點:《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上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435頁。

⑩⑬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曾紀澤日記》中冊,第637頁;第714頁;第679頁;第775~

776頁;第669~670頁;第670頁;第668頁;第667~668頁;第670頁;第671頁;第671頁;第684頁;第685頁;第691頁;第639頁;第712頁;第736~762、856~870頁;第708頁。

⑪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參見丁建良:《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沈弘等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46頁;第246頁;第245~246頁;第245~247頁;第245頁。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第101頁;第114頁;第134、140、146、166、182頁;第383頁;第107頁;第159頁;第476、762~763頁;第295頁;第305、422、676、733、758、925頁;第642頁;第676~677頁;第211頁;第979頁;第52、59頁;第906、931頁;

第 363 頁。

⑭張立真：《曾紀澤本傳》，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43 頁。

⑮⑯喻岳衡點校：《曾紀澤遺集》，長沙：嶽麓書社，1983 年，第 158 頁。

⑰嘉托瑪還撰有《富國真理》，山雅谷譯，清光緒二十五年圖書集成局鉛印本。

⑱⑲⑳段懷清：《曾紀澤怎樣學英語——兼談他的“中西合體詩”》，上海：《文匯學人》，2018 年 12 月 7 日。

㉑㉒何天爵 (Chester Holcombe)：《真正的中國佬》，鞠方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第 42~43 頁。

㉓段懷清認為這部引人注目的英文小說《羅斌孫日記》，當為英國小說家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參見《曾紀澤怎樣學英語——兼談他的“中西合體詩”》一文。

㉔《曾紀澤日記》上册，第 581 頁；中册，第 660、669、675 頁。

㉕參見田濤、李祝環：《接觸與碰撞：16 世紀以來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法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45~166 頁；宋桔：《〈語言自適集〉的漢語語法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1 頁。

㉖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台北：上海印刷廠，1985 年，第 240~247 頁。

㉗林金水、吳巍巍：《傳教士·工具書·文化傳播——從〈英華萃林韻府〉看晚清“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的交匯》，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8 年第 3 期。

㉘徐茂明：《互動與轉型：江南社會文化史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24 頁。

㉙周振鶴：《華英說部撮要》，載氏著《智者不言》，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第 189~190 頁。

㉚葛桂錄主編：《中國古典文獻的英國之旅——英國三大漢學家年譜：翟理斯、韋利、霍克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 年，第 37~138 頁。

㉛曾紀澤：《英文舉隅序》，載汪鳳藻編譯《英文舉隅》，光緒五年 (1879) 同文館集珍版 (所據日本關西

大學藏本有“鴻城”、“犀香書屋”兩藏書印)；或以為《英文舉隅》有同文館光緒四年 (1878) 版，參見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第 160 頁。

㉜Tseng Chi-tse,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3, no. 1 (1887), pp. 1-12;《花甲憶記》作 *Oriental Quarterly*, 不確。

㉝顏咏經口譯，袁竹一筆述：《中國先睡後醒論》，上海：《申報》，1887 年 6 月 14 日、25 日。顏咏經可能即顏永京 (顏惠慶之父，時為聖約翰學院學監)；袁竹一，原名袁康，曾任《萬國公報》編輯。參見楊代春：《〈萬國公報〉與晚清中西文化交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3、68 頁。

㉞石川禎浩：《晚清“睡獅”形象探源》，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09 年第 5 期。

㉟楊國楨：《林則徐傳》(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17~218 頁。

㊱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係史新探》，成都：巴蜀書社，2004 年，第 35~37 頁。

㊲鄒振環：《光緒皇帝的英語學習與進入清末宮廷的英語讀本》，北京：《清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㊳趙樹貴、曾麗雅編：《陳熾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第 74 頁。

㊴保爾·密爾茨：《外交官培訓指南》，楊迪霞、金錫權編譯，北京：《外交學院學報》，1995 年第 1 期。

㊵康格夫人 1905 年 4 月 17 日給愛女的信，載薩拉·康格：《北京信札》，沈春蕾譯，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年，第 297 頁。

㊶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李憲堂、侯林莉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88~190 頁。

作者簡介：鄒振環，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433

[責任編輯 陳志雄]